

義產共府改無

社 鐘 民

無政府共產主義：他的根據和

Anarchist Communism Its Basis And Principles

克魯泡特金原著

一

無政府——即無統治制度的社會主義——有兩重始原。他是由使十九世紀，而猶以使他第二期有特色的，經濟和政治領域之思潮的兩大運動所產生。無政府黨同一切的社會黨是一樣，以爲土地，資本，和器械的私有，將來必廢；而一切生產的需要物，將來必定變爲社會的公共財產，且由財富的生產者公共管理他。又同政治的急進主義的，最前進的代表是一樣，以爲社會的政治組織之理想，是事物的一個情景（Condition），在這個情景，那政府的職務（Function）將縮至最小度，個人恢復他的自發（Initiative）和行動的完全自由，且藉自由團體和聯合會——自由組織

的——以滿足人類無限的各種需要。大多數無政府黨對於社會主義所得到最後的斷案，就是完全否定那工錢制度（*Wage-System*），主張共產主義。至於政治的組織，他們給那邊所說的急進派的程序之一部，以一個更前進的發展，所得到的斷案，以爲社會的最後目的，是減縮政府的職務，以至於無——就是來到一個無政府的社會。無政府黨更以爲這是社會的和政治的組織之理想，他們必定不要捨棄他，以待未來的世紀，且惟是我們的社會組織，實現那些變更——這是同上述的兩重理想相符合——和組織一個近於他的社會，將來才有生活的時機，和有利於公共的團體。至於無政府黨思想家所採用的方法，完全不用那些『烏託邦派』所用的。無政府黨思想家不倚靠玄學的觀念（如『天然權利』，『國家的責任』，等等）去建立什麼是——在他的意見——實現人道的最大幸福的最好之環境。在反面，他跟隨近代哲學的進化論所跡尋的途徑——可是不再去走那斯

賓塞爾 (Herbert Spencer) 所常用的單純類推法 (Analogies) 之不可靠的道路。他研究人類社會，不把社會在現今和過去的眞狀態失掉；且不上人類或分立的個人以他們所不具的最高性質，他單是當社會如同一個集合的有機體，想找尋出聯合個體和合作 (Co-operation)——爲種的幸福——的需要之最好的方法。他研究社會和想發見他趨勢 (TENDENCIES)，過去的和現在的，他的增大的需要，智識的和經濟的，且在他的理想，他不過指進化的那一方面走。他對於人類團結的眞正需求和趨勢，以及偶有的災難 (智識的缺乏，流徙，戰爭，獲勝)——阻止那些趨勢，使他們不能滿足，或暫時使他們無用——分別清楚。他更斷定以爲那兩大著名——雖然常常爲人所不覺——的趨勢，在我們全部歷史中，第一個是趨向完全的工作，以求在社會產生一切財富，這樣最後令他不致因爲個人的分立，不能區分公共生產的部分；第二個是趨向個人的最圓滿之自由，以

達到一切的目的，不特利己，且利社會的全部。因此，無政府黨的理想，不過是集合起那些他以為是進化的第二狀態（PHASE）。他再也不是一件信仰的事情；他是一件科學討論的事情了。

十九世紀最大特點中的一件事，就是社會主義的發達，和社會黨意見在勞動階級中散播的速度。這是人人所知道的。七十年來我們已經看見我們的生產能力，實然增高，無可比倫——其結果便成財富的積聚——這已出乎那最熱誠的希望之外了。但是，因為我們的工錢制度，這財富的增進——是由科學家，管理者，和勞動者，合力所做成的——結果不過資本家手裏的財富，越加積厚；至於那大多數困苦的增加，人人生命的不穩，已經成了勞動者的命運。那拙劣的工人，繼續找尋工作，都墜下無告孤苦的地位；甚至那最高工資的良工和精巧的勞動者，他們固然比從前安樂些，可是工作常在恐慌的底下，因為那有些不斷的和不免的工業變動

，與資本的變更，他們不久便如那些拙劣的工人一樣了。近世富豪揮霍人工的生產，極奢盡侈，而貧人則流於困苦，以至不能生存；兩者分裂，由此漸離漸開，循至破壞社會的統一——他的生活的和諧——和危及他的進步之前進的發展。同時勞動者漸漸不肯忍受這分爲兩個階級的社會，因爲他們漸漸知道近代工業的財富生產力，知道生產財富的勞動力，和知道他們自己的組織力。社會的一切階級，漸漸干預公共的事情，智識漸漸散播於羣衆。他們要求平等的心理，因之漸漸強壯；他們要求改造社會的聲音，亦漸漸響亮；終之，他們不復久安於愚蠢了。勞動家要占他所生產的財富之一分；他要得生產的管理權之一分；他不獨要求增高安全，且還要求享受科學和美術最高快樂的完全權利。這些要求，從前不過出自社會改革家之口，現今在工廠中做工的，或在田中耕種的，都起首說了；況且他們這麼同我們公道的情感相吻合，所以他們得到權利

階級自己的幫助，由少數漸漸增起來了，社會主義因此成爲十九世紀的唯一概念；無論權力抑或僞的改良，都不能阻止他們的往前發達了。

勞動界的政權，遂漸擴張，雖似少有希望；但是這個調停，不能使經濟狀況，有同樣的變更，因此顯然見其爲欺騙。他們不在物質上增加大多數工人的狀況，所以社會主義者的口語是：『經濟自由，是政治自由唯一堅固的基礎』。幸福的工錢制度和他的惡果一日不變，那社會黨的口語，將繼續鼓舞那些勞動者；社會主義也將繼續生長，不至實現他的程序不止。

經濟的思潮大運動之外，又有關於政治權利，政治組織，和政府的職務的類似運動，在那裡進行着。政府所受的批評，正如資本所受的一樣。當大多數的急進派以普通遍選舉和共和制度爲政治智能的最高點，有少數人則更進一步。那政府和國家的職務，以及他們同個人的關係，都

受了很深銳的批評。代議政治已經在各處試驗過，他的缺點已經漸漸顯著了。而且他的那些缺點，不單是偶然的，却是由那個制度遺傳下來，這也顯而易見了。議院和他的行政部，已經被人證明不能辦理社會的一切事業，和調理一個國家各部分的各種和常常相反的利益。選舉被人證明不能找出那些可以代表和管一個國的人；除非以一黨的精神，有些事務不能不做哩。這些缺點，怎麼顯著，所以代議制度的原理，都受了批評，他們的公道，都受了懷疑。還有，社會黨上前要增進政府的權力，把現在個人相互間的經濟關係之管理權，都信仰給他，那麼，一個集權的政府之危險，更加彰明。我們所要問的，就是一個政府操了工商業的管理權，不怕對於自由與和平，有常常的危險麼？或他能做良經理麼？

十九世紀初葉的社會黨，不全知道這個問題的絕大困難。他們雖然很知道經濟改革的必要，但有許多却不注意個人自由的要求；所以有些社

會改良家，因為想求達到一個好像社會黨意思的改革，甚而至於神權政治，專制政治，或甚凱薩主義（Caesarism）都肯使社會服從他。所以我們見得在英國和歐洲大陸，抱高尚意見的人，分爲兩種：就是政治急進派和社會黨——前而不相信後的，他們以爲後的對於政治的自由，危險的地方，所謂政治自由，是由文明的民族，經過許多奮鬥才能來的。到了現在，全歐的社會黨都變爲政黨，且懷抱那德謨克拉西的信仰，但還有些公正的人，很怕那什麼『平民國家』（Volkstate）以爲如果他的政府，既受了一切社會組織的管理權——包括生產和財富（本篇所譯財富二字，原文爲 *Wealth* 有人譯爲「財產」）的分配——他對於自由的危險，正如各式的專制政治一樣。

四十年來的進化，已經預備一條道路，顯出一個高等形式的社會組織——這個組織，可以保證經濟的自由，且不減縮個人，使成爲國家的奴隸

——是必要的和可能的了。政府「始原」，已經有精密的研究，所有一切說的他神聖之玄學概念，或說由『民約』演化出來，已經爲學者所不取，他的始原，實由於相對的近世，至於他的權力之生長，適和社會分爲權利和非權利兩個階級在歷史上一邊的消長一樣。代議政府的真正價值，也可以約限——他是一個工具，曾有功於反抗專制政治的競爭，却不是自由政治的組織之理想。從哲學的系統看，國家（文化國 *Kultur-Staat*）內邊的進步，如果不爲國家干涉所阻礙，則進步非常之速。由此，可以明白社會生活（本篇所譯「生活」二字，原文爲 *Leben*，亦可以譯作「生命」）的往前發展，不是在於把集權和法定的職務，交給治人的團體，惟在於地方的（*Local*）和職務的（*Functional*）分權——把公共的職務，依着也們做事的範圍，和職務的性質，再次分開，以至於成爲自由組織的團體，各個有自發的能力，廢除現在看做政府一切職務，

這種思潮不特表現於文學，並且曾表現於人生中的一個有限部分。『巴里自治團』（Paris Commune）的起義，和隨其後的『卡達觀之自治團』（Comune of Cartagena）——英國歷史家的態度，似乎不甚注意這一種運動（作者：做這篇文章的時候，是旅居英國，故本篇說英國的事情略多。）——開歷史的新紀元。如果我們分析不但是這個運動的本身，而且他留在人心中的印象，以及當共產革命時所表現的趨勢，我們必定認得其中有一個標示，指出在將來的人類之團結——社會越發展，他們便越加進步——必定創始一個獨立的生活；而且他們更要改變各個民族較不進化的部分：例如不復以法律和強權壓迫他們的意見，或以大多數的規則——這些常常是凡庸的規則——束縛他們。同時自治團內的代議政府之失敗，可見自治和自理一定要實行，不徒具地方的意味，便算了事，自治宜推廣於自由社會內的生活之各種職務，才有效驗；若單以地方的區別

，限定領域，行事，統治，是不中用的；一代議政府在一個城內的不完全，正如在一個國內無異。這種生活的表示，足以助無政府學說的張目，和給無政府黨思想以一個新衝動。

無政府黨承認剛才所講的傾向，經濟和政治自由的兩種趨勢之公道，且在此看見平等的需要——這是組織成歷史上一切競爭的要素——的兩種不同之現象。所以無政府黨同一切社會黨一樣，告那些政治改良家道：『社會一日仍分爲兩個對敵的營盤，工人還是——從經濟上說——雇主的奴役，則決不能有——從政治平等的意義——根本的改革，政府的權力定也不能限制』。但我們對於平民國家社會黨，也說：『汝們不能變更現在的產業狀況，除非同時痛加改變那政治組織。汝們必定要限制政府的權力和

廢棄議院的制度，『一個生活的新經濟狀態，同一個新的政治狀態互相吻合。絕對的君主政治——就是朝廷制度——同農奴制度相吻合。代議政治同資本制度相吻合。兩者果然都是階級制度。所以在一個社會，資本主義和勞動者的界限，既然消滅，自不必要這樣的一個政府：他也將成爲一個『時代錯誤』（Anachronism），一個障害。自由勞動者將要一個自由的組織，而這個組織的基礎，只有『自由契約』（Free Agreement）和『自由合作』（Free Co-Operation），不犧牲個人的自治權於國家——一切浸透的干涉，所以無資本家的制度，包含無政府的制度』。

。這麼看來，人類解放將脫離資本家和政府的壓制：無政府的制度成爲現世紀兩大思潮的一個綜合。

無政府主義者達到這個斷案，証明同進化哲學所達到相吻合。進化哲學告訴我們組織的黏性（THE PLASTICITY OF ORGANIZATION），指出有機體適應他們生活狀況的妙用：這樣的才能之相續發展，使那結合體適應他們的環境，和令那結合體中的各個分子，適應自由合作的需要，兩者越加完備。他又使我們知道在有機界全體中，一切生活能力發達，逐漸完全，且同無缺的有機體，變為複雜的結合體相比例，由此他促進那社會的道德家（Boeial Moralists）關於人類天性可能圓滿的性質所已說過的意見。他又告訴我們在生存競爭的長途中，『那最適的』就是那些能把智能與生產財富應要的智識聯合的，不是那些現在最富的，他們所以能成為最富，因為他們或他們的祖宗從前有一時是最強的，所以想指出『為生存的競爭』，不要單獨懂得他的狹義，以為各個體間因為維持生活而互相競爭，惟從他的廣義，以物種的一切個體適應那最良的狀態。

況，是爲着種類的生存，以及爲着各個和全體最大可能量的生活與幸福，他（指進化哲學）允許我們由人類的社會和習慣，演譯那道德科學的律例。他告訴我們那最微小的分子在道德進化受積極律例的主使，和那最大的部分受自然生長的他的感情所支配——這種感情，如果生活狀況，助於他的生長，他便發展了。他所以促進社會改革家的意見，以爲改良人類，必要變更生活的狀況，代了那想以道德的教訓，去改良人類的性質之行動，因爲生活正在道德的反面進行，空談道德是不行的。最後，無政府黨由生物學的眼光研究人類社會，又研究歷史和現今的趨勢，達到的斷案，以爲往前的進步，是在財產公有和在『全工』（Integrated Labor）的道路上，與個人最完全的能有之自由相聯合。

我們所稱爲進化哲學最好的解釋者斯賓塞爾（Herbert Spencer）關於政治組織所得到的斷案，很與我們的相印合。他說：『我們現在向着前

進的那個社會之法式』(Form)，『其政府被減縮至最少的可能之總數，而自由增至最大的可能之總數』(註一)，當他在這些話——他的綜合哲學的斷案——反對孔德 (Auguste Comte) 的斷案，他得到的很和蒲魯東 (Proudhon) (註二) 巴枯寧 (Bakunin) (註三) 的相吻合。還不止此，斯氏所用的立論方法和例証(每日供給的食物，郵務局等)，我們在無政府黨的著作裏頭，也有同樣的發見，雖然兩者都各不知道各的計畫，但思想的路徑，實在是一樣。

(註一)見斯賓塞爾的 (Essays, vol. III.) 我很知道斯氏在那篇文章中——往後數頁——用下引的話，毀壞了上述的陳說之力量，他說：『我不特以國家的限制力，駕馭個人與團體，或個人的羣合，是應要的。我也以為他應該使用他的權力，要較今日為有效力，和更加推廣些』。(一四五頁)他又想分政府的職務為消極限制的(願意的)和積

極限制的（願意的）兩種，我們知道在政治生活中，不能特立這樣的分別，前者一定達到或甚至包括後者。但是我們必定要分別開他的哲學系統和他的哲學系統的解釋。我們所能說的，以爲斯氏未嘗寫出所有應該由他的哲學系所推得的斷案。

（註二）見

Idee Generale Sivr La Revolution
Au X X E Siecle; Et Confesations D
Im Revolutionnaire

（註三）見

L Ttaes A Vm Fancais Sur La Cvris
Actuelle; Is Emhive Knouto-germanif
ne; The Stale Idea Omd an Archy'
(russi n)

再說，當斯賓塞先生那麼用力——甚至沒有動及情欲——討論（在他的行